闲话文人 唐宝民

凌叔华与伍尔芙

凌叔华

伍尔芙

凌叔华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早年曾执教于武汉大学；伍尔芙是英国著名女作家，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两个人，分别生活在相距万里之遥的不同的国度，且从来不曾见过面，但实际上，据翻译家杨静远回忆，这两个女作家之间，虽然相隔万里，却通过书信这一形式，有过一番不凡的交往。

1935年的一天，有一位叫朱立安·贝尔的外国学者到武汉大学讲学，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外甥。朱立安·贝尔经常到文学院院长陈源家做客，因此与陈源的妻子凌叔华相识了，二人经常在一起交流文学，成了好朋友。当得知朱立安·贝尔是著名作家伍尔芙的外甥时，早就对伍尔芙崇拜有加的凌叔华提出了想要与伍尔芙交往的想法，朱立安·贝尔立即表示会帮助她们之间建立联系，随后，他便把凌叔华介绍给了伍尔芙，两个人就这样通过书信开始了交往。

伍尔芙是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声誉的著名作家，但她一点没有因此而轻视凌叔华，特别关心这位远在异域的中国女作家，对于凌叔华的每一封来信，她都认真回复，对于凌叔华在信中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她都认真进行解答。出于想要帮助凌叔华的考虑，伍尔芙建议凌叔华用英文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并答应书写好后，她帮着联系在英国出版。凌叔华接受了她的建议，便开始用英文写作，写的都是带有中国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文章，写好一章后，就寄给伍尔芙，请她指正，伍尔芙看过后，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肯定，并指出其中的不足，凌叔华再按照伍尔芙的意见进行修改。

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伍尔芙是著名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她的创作，十分重视技巧的创新，可是，在指导凌叔华的时候，她却建议凌叔华要严格按照现实主义方法去写，不鼓励凌叔华运用写作技巧；她给凌叔华开列的读书计划中，也不包括现代主义的作品。这样看似矛盾的做法，其实是在为凌叔华负责，要等到在写作方面得心应手的时候才能用，在最初的写作中，只有踏踏实实地用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才能使自己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凌叔华在写作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刻意迎合英国读者的倾向，这一点，被细心的伍尔芙看出来了，她特意就此告诫凌叔华：不要为顾及英语规范而使自己的文章失去民族风味和个人风格，要保持地地道道的“中国味儿”。

在信中，伍尔芙除了与凌叔华谈论文学创作外，还向她讲述了自己的生活，介绍了大战前夕英国令人担心的一些事情，以及她自己的苦闷、迷茫，这些心里话，她能向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个异国女作家倾吐，说明她已经把凌叔华当成了自己的知音了。

凌叔华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能和伍尔芙相见，然而，这个愿望却始终没能实现。英国卷入战争后，伍尔芙与丈夫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她早年患有精神分裂症，在战争年代，这种病便日渐严重，渐渐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1941年5月28日，她用石头填满口袋，投入了家附近的一条河流，结束了自己59岁的生命。在伍尔芙去世六年之后的1947年，凌叔华来到了英国，但她已经没有机会再见到伍尔芙了，只能怀着悲痛的心情，到伍尔芙生前最后居住的地方对伍尔芙进行了悼念。当年，伍尔芙提议凌叔华用英文写书，并答应帮助她在英国出版，在伍尔芙去世十二年之后，这本书终于在由伍尔芙和丈夫创办的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获得了英国文学界的广泛认同，凌叔华特地在一本附有自己手绘的七幅精致水墨素描画的精装本上写上了伍尔芙和她丈夫的名字，把它送给了伍尔芙的丈夫，以此来纪念伍尔芙。

季候物语 周华诚

梨花

晚间读书，随手翻到《唐寅集》里一篇《秋庭记》，正应合这个时节。窗外夜凉，小雨。“四时之序，代谢相因，而摇落凄楚者，惟秋则然。”

唐寅是怀了一腔悲秋的情绪。他说，“善于保养之君子”，在这个时节是不出门的，只是深宫端居，以养心神。黄菊满篱，青山半窗，可以心满意足。

唐寅这个人，喜欢春天，大概在春天可以摘了桃花换酒钱。我却喜欢在秋天出门。

丙申秋日，我出远门，到了浙西一个叫高田坑的村庄。那里偏远极了。海拔一千米，不算太高；田却稀罕得很：一撩一撩，如笔墨撩开的笔触，层层展开在悬崖边上。如此种田，何其艰辛。

高田坑的半山腰上，有茅亭一间，山下可见黑瓦一片。层层叠叠的黑瓦边上，一株梨树兀自伸出。

这深秋的梨树，没有一片树叶，只余老树与颓枝。

在这一个高山里的村庄，以其闭塞，尚留存着那么完整的夯土墙与黄泥屋。

在我的回忆里，夯土泥屋，是实实在在的过去生活。一个农村人，一生中可能只造一座房子。那座夯土房子成为他在世间存在过的最有力证明。

老人说，只有千年的土墙，没有千年的砖墙。青砖墙可以风化，垮塌，可泥土总归还是泥土。玉门关的汉长城，那多少年了，高高的夯土墙依然倔强地耸立在戈壁滩上。秦时明月汉时关，当年点起狼烟的烽火台，而今仍在。

我在高田坑村的半山腰上独坐，就看着那一片夯土泥屋，以及泥屋上的黛黑鱼鳞瓦，层层叠叠，叠叠层层，覆盖成一座村庄。

这样的村庄，要是换了在道路宽敞的地方，早就是另一副样子了吧。

道路宽敞的地方，人们走路疾快，脚下生风，早早就奔前头去了——奔在前头的好处很多，老房子拆掉，建起小洋楼。水泥浇筑，磁砖贴遍，不锈钢的栏杆闪闪发光，红色的洋瓦在阳光下鲜亮无比。

可是高田坑，太远了。山路曲折又漫长。那里的人，还像一百年前一样缓慢生活。他们在悬崖边上开地，以肩膀拉犁。人与人的恋爱，从馈赠一枝梨花开始。

穿蓑衣的人与牛，行走在光滑的石阶上。

千年的雨水，滑落在碧绿青苔。

——用时下流行的文艺腔调来说，“所谓现世安稳，想来不过如此”。

现在，轮到外面那个世界的人们惊叹了。

当别处村庄都水泥浇筑，不锈钢和洋瓦都闪闪发光时，居然还有一个村庄，像被时光遗弃一样，完好保存着这样的生活样貌。居然还有那么多的夯土泥屋。居然有蜿蜒曲折的石径。居然还有一株一株的梨树，长在村庄的角落。

有时候，春天和秋天，是一样的。远和近，是一样的。疾快与缓慢，也是一样的。

只要把目光放得足够远，它们就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漫长的时间里，你来了，你又走了，我们没有相见，其实这也是一种相见。我甚至看到，高田坑的男人正支起夹墙的木板，他们挥动木杵，夯墙的劳动穿越四季，定格成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这个时候，蓑衣上的春雨开始成串地滑落。你从屋角转身走来，梨花一枝一枝，次第开放。

轻叩名门 王路生

追忆梁信先生

1月28日，农历鸡年正月初一，国内的一条消息引发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电影《红色娘子军》编剧、著名剧作家梁信先生在广州与世长辞，享年91岁。

梁信，原名郭良信，1926年生于吉林省扶余县，著名电影编剧、作家。曾创作《红色娘子军》《南海长城》《从奴隶到将军》等多部经典电影剧本。他的成名源于电影《红色娘子军》，而他一生的深深情结亦源于生活中的红色娘子军。我作为一名地方媒体的记者，也因了红色娘子军而与梁信先生结下了一段特殊的情缘。

2006年7月的一天，我到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拜访红色娘子军排长王运梅，运梅阿婆与我父亲是老朋友，父亲在1979年担任琼海县民政局长期间，曾为包括王运梅在内的娘子军的历史错案做过调查了解和平反工作，因此与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王运梅阿婆的父亲名叫王启尧，与我父亲王启銮同辈分，都是族内兄弟，因此，王运梅阿婆称我为“舅舅”。每次见面，她都会亲切地叫一声“舅舅”。那天，她拉着我的手，说：“您认识梁信先生吗？”她问梁信干什么？我一时疑惑。她接着说：“我想要一本梁信署名的《红色娘子军》一书。”她进一步说，人老了，就会特别怀念过去的当兵岁月。我答应她，帮她找到这本书。后来，我从时任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锦爱的口中得知，他单位曾与梁信先生有过书信交往。于是，我索要到梁信先生的广州地址，斗胆向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在信中讲述了王运梅老红军想要他写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一书的细节。两个半月后（2006年10月8日），梁信先生终于寄来他的书。至于为啥间隔了两个半月，他在信中述说他因身体欠安，入院治疗的细节，他一出院就动手写了这封信和寄来了《梁信作品荟萃》一书（内有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

王运梅收到此书后，将书放置在她的床头，闲时拿出来抚摸，思索良久。我遵她嘱，给梁信先生复了信，感谢他对红色娘子军的关心和支持。

广州与海南，因了梁信和娘子军的情缘，一直延伸着，续写着。

2007年9月21日，庆祝羊城晚报创刊50周年暨岭南文化名人颁奖晚会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我作为羊城晚报“十大金牌读者”出席了晚会，在中山纪念堂会客厅，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梁信先生。他是岭南文化名家之一，专程前来参加颁奖盛典。梁先生得知我来自红色娘子军故乡，非常高兴，他拉着我的手说了他和娘子军的故事。临上广州前，王运梅阿婆和卢业香、陈振梅等11位健在的娘子军，特别委托我要向梁信先生致意，以感谢他将她们的一段历史写进电影的伟大贡献。王运梅阿婆还委托我带上她种植的胡椒树所收获的胡椒粒，约三斤重，专程送给梁信先生。

本文作者在广州拜会梁信先生。 袁铭辰 摄

2013年9月14日，王运梅辞世，享年103岁。2014年4月19日，最后一名红色娘子军班长卢业香辞世，享年100岁。梁信先生从报纸得知她们辞世的消息后，曾多次与我通话，充分表达了他对娘子军的深厚情感与缅怀之情。因为，他的一生，早已与红色娘子军及其所铸就的这份荣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永不分离，相伴终生。

醉饮山河 南子

牧人巴海

土地，让人能够落下脚，它给它的依存者提供存活下去的起码条件。不让人饥饿不让人寒冷，大地，它应该是养人的。而牧人，就是在这个以草场耕种放牧的一个庞大的群体。

来到了木垒的乌孜别克族人，夏季在大南沟、东沟以及开垦河以南的斯特克萨依，琼塔斯、塔依唐巴拉干、喀因得布拉克等山区放牧。这些地方被称为“商人们的夏牧场”；冬季在以博斯坦乡东部历史上曾被称为“商人们的五条沟”为冬牧场。“商人们的五条沟”指的就是甘沟，萨尔赛尔克，哈夏霍勒，萨马勒萨依和达吾提萨依沟。

车在前行，远方的一片开阔平原在伸展，白色的雪团在低压着大地，喀因得布拉克山区遥摇遥未及。

终于，车停了下来。狗在叫，在黄昏里并不显凌厉，只是一种温和的呼唤。这是巴海家的狗。在牧区，几乎每个牧民家里都养狗，没有狗的牧人家多半是那些沉默之人，大概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狗吠意味着陌生人的到来。

巴海是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族乡的一个牧人，也是个乌孜别克族人，他的脸黑而枯涩，牙床突出，一双眼睛像岩石样的坚硬。2002年，他就在这喀因得布拉克深山里经营着一家至今还没有名字的客栈。这个客栈从山上到山下有80多公里的路程。当地人就叫它“牧民驿站”。它是一个供前来转场的牧人中途休息的好去处。

柴草的烟熏味远远地飘了过来。房子是焦黄的土坯墙，门板枯朽，补丁似的，堵在墙的窟隆眼里。清油桶，白酒，一大袋子面粉以及一些杂物很敦实地放在木板子上，大人和孩子的衣服搭拉在屋子里的绳子上，重重地垂了下来。太阳快要西沉了，空气中渗进来青暗的凉气。屋子外边残雪斑驳，牧人扎依提的马低下脑袋，用前蹄重重地刨着，费劲地啃食地上露出来的草皮。

巴海的漂亮而有些邋遢的哈萨克族媳妇胡艾汗面对我们惊讶的注视，露出一抹温和的浅笑。

我还看见了，巴海有一张黑黑的十分端正的脸。黄昏的阳光照他的背部，有如一张逆光照片。尽管他身上肥大的棉袄绵裤使整个身形显得笨拙，腿还稍稍有些罗圈，但是，我还是感到了他内心丰沛的喜悦。几个山上的牧人围上来了，有人吆马，有人和巴海在一起闲话，身影在暮色中变得黯淡。

2002年，牧人巴海就在这里接管了山里唯一的一家饭馆和旅馆，那时候，上山来往转场放牧的人非常多，胡艾汗做的拉条子，羊肉汤，手抓肉好吃的很。牧民们上山转场，都要特意绕道来这里尝尝她的手艺，看胡艾汗变魔术似地变出好多可口的食物，然后与主人喝点酒，再聊一聊山下面县城里的事情。羊群在屋子外面的草地上吃草，心情和主人一样的惬意。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起，上山转场的牧民少了，原先紧挨着自己家的好多房子，一下子空了好多。

我在北疆好多牧区见过这样半瘫垮的空房子。牧民定居到“新村”了，住上了“抗震安居房”，只要是人一离开，风就带着沙子跟过来，几年前还住着人的房屋，一下子被空洞和灰尘掩埋了，成了废墟。

“下山去吧。”这几年，不断地有牧民从山上搬下去了，在走之前，他们和他打招呼的时候，都这样劝巴海。

“再等等。等山上都没人了，我再走也不迟。”巴海说。晚上，巴海煮了羊头肉招呼我们吃。一会儿，木门被撞开了，又进来了一个穿黑棉袄的男人，4个男人对面坐着，撕着嚼着羊肉，没有浓郁的松树林没有心里荒凉的戈壁滩，只有透明晃闪的液体。天色混沌难辨，不知是黄昏还是破晓。他们喝着酒，还唱了。不管是喝还是唱，他们的姿式都让人感觉到踏实。